

北京文物與考古



43-80714 1 2B



## 前 言

祖国的首都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而又富于革命传统的都城。

几十万年前，北京地区是中国猿人的故乡。有史以来，这里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活动区域。从古燕国建都算起，已有三千年的历史。汉唐以后，是我国北方的重镇，辽金建都以来，又成为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历代各族劳动人民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北京地区的地上和地下保存了极其丰富的遗迹和遗址，也留下了很多有意义的史迹。

广泛深入地开展北京历史考古的研究，对于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和建设人民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计划试出版北京历史、考古方面的一套有关丛书，主要是将我队工作中取得的科学成果和积累的原始资料加以整理，向社会上提供，俾作兄弟单位和从事北京史研究工作者的研究、参考之助。

本辑是该丛书的第一辑，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报导了我队近几年考古发掘工作中的重要发现；二、介绍了保存在地上的历史文物遗迹；三、报导了北京地区历代重要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的研究的初步成果。

最后，希望兄弟单位和专业工作者，在研究或参考我们这些资料时，给以订正和指导，这对促进我队工作的开展和提高将是有益的。

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

1983.4.

# 北京文物与考古

## 目 录

### 前 言

- 燕国部族及部族的联合.....葛英会 (1)
- 北京东南郊三台山东汉墓发掘简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19)
- 北京西郊辽壁画墓发掘.....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28)
- 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的白瓷窑属问题商榷.....马希桂 (48)
- 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55)
- 金代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考释  
.....赵福生、王武钰、袁进京 (73)
- 明代北京的城垣.....傅公铤 (94)
- 明永乐大钟.....夏明明 (122)
- 北京清代王府概述.....刘之光 (129)
- 右翼宗学遗址考辨.....杨乃济 (176)
- 清代的祭堂子.....傅同欽 (188)
- 北京的官仓.....于光度 (197)
- 清光绪初期紫禁城内河道沟渠的施工.....方裕谨 (222)
- 路振、王曾所记的燕京城.....贾敬颜 (233)
- 试析北京成为首都的原因和过程(上).....徐自强 (240)
- 辽、宋高粱河战役及其战场.....于光度 (247)
- 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运和尚.....苏天钧 (258)
- 南海子.....张超 (266)
- 西黄寺与喇嘛教.....陈平 (278)

# 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

葛英会

## 一、前言

燕，作为地处我国北方的邦国，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有关燕国的历史，史籍所载，简而不明，舛误亦多。封地问题，都邑问题，至今意见纷纭，就连燕国公、侯的世系，谥号重复杂乱，似乎是一笔糊涂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当时燕国的社会概况是个什么样子？这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尚待解决的历史课题。

大家知道，在史籍中，燕的历史始自周初对于燕召公奭的荣命册封。对此，郭沫若先生早就提出了疑义，认为“燕……系自然生长的国家，与周或通婚，或通盟而已”。<sup>①</sup>侯仁之先生则更加明确地说：燕“不是周初所封，还在武王灭商以前，燕这个自然生长的国家已经存在。”<sup>②</sup>这些精辟推断应当怎样阐发？燕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金文资料证明，燕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的祖庚、祖甲时期。从这个时期直到商代晚期，燕国社会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严重地残存着部落联盟的遗痕。如果以燕地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证发，又可发现，在西周以至春秋、战国七、八百年中间，燕的国家仍是建立在部族联合的基础之上。部族与部族联合的存在，是燕国历史上封地、都邑、世系诸种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本文试图论述的中心问题。

说商代后期到春秋、战国时代燕国社会仍旧残留部落联盟或部族联合的结构形式，这似乎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命题。不，商周时代我国社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

《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战国策·齐策》：“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

《逸周书·殷祝》：“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

《史记·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武王持大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

《逸周书·世俘解》武王克商：“遂征四方，凡愍国九十有九，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尚书大传·洛诰》：“天下诸侯之悉来进受命于周而退见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

《史记·陈杞世家》：“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

《汉书·贾山传》：“昔者，周盖千八百国。”

以上所谓“国”，应是指部族而言，文献上亦称之为“氏”。如夏代的斟寻氏、斟灌氏、有鬲氏、有穷氏、有扈氏等；殷代的殷氏、北殷氏、空桐氏、目夷氏、来氏、稚氏等。这些所谓“国”均指夏人、商人本身的各部族，不应理解为夏商王国以外的诸侯国。文献所载诸侯国以“千”“万”称，是指参加联盟的氏族、部族而言。及于西周，其分封制乃是这种制度的沿续，故王国维把周代社会看作是诸侯的联盟。当然，在商周时期，建立在阶级矛盾之上的国家已经在氏族制的母体上开始萌发并不断成长，但氏族联盟的残余仍旧相当顽强。这是氏族制与阶级国家并存与消长的时期。

燕，不论在商在周，都是这种部族的联盟中的一员，其社会面貌也应大体如此。

既往的七十年代，是燕国古文化发现与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商周遗址的连续发掘，北京昌平台浮西周木椁墓的发现，辽宁喀左大凌河沿岸商周窖藏青铜器接二连三的出土，朝阳地区以及西刺木伦河以北的克什克腾旗，辽河以东的抚顺、新民等地商周青铜器的不断问世，使燕国古文化大放异彩。同时，历史考古学界凭借这些珍贵文物，对西周燕国早期史迹，做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并进而对该地区商代的历史概况做了探索，逐渐充实着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为了展开我们的讨论，现将各家研究成果的要点，归纳撮述于下：

(一)北京房山县琉璃河西周遗址是燕召公的始封地（本文作者认为该地仅是召公封地的一部分，并且不应称作始封，下详。），此即《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幽州条良乡县“在燕为中都”记载的源本<sup>①</sup>。

(二)琉璃河、芦沟桥、马厂沟出土燕器铭文中的匱侯就是匱侯旨鼎（《恒轩》1、16）铭文中的燕侯旨。并认为旨是召公奭的儿子，即第一代燕侯<sup>②</sup>。

(三)据琉璃河出土的箕鼎铭文，认为《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所说：燕召公“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sup>③</sup>。

(四)箕族铜器在燕地几度出土，有的铭文又明确记载箕与燕侯有关，确认北方燕地曾是商代箕族（或其一支）的所在<sup>④</sup>。

(五)喀左北洞出土的二号铜鬲铭文有“𠄎𠄎”之称，确认该称应是“孤竹”二字的古体，并认为河北卢龙至辽宁喀左一带应是古孤竹国的范围<sup>⑤</sup>。

(六)从箕、孤竹等商代有名的氏族在西周初年继续存在的事实，推断这些部族的氏族组织在周代仍然得到保留。这些部族不仅在周代为发展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做出了贡献，并且早在三千年前的商代，就以辛勤的汗水，浇灌了祖国北方乃至东北辽宁地区的青铜文明之花，成为商北方的诸侯国<sup>⑥</sup>。

(七)由西周燕器出土地点的分布区域可知，由北京往北，经承德、凌源、宁城、喀左，再沿大凌河到朝阳、北票，通向我国辽阔的东北地区，这是周初由燕到肃慎的重要通道，说明西周燕国从一开始势力就延伸到长城以北很远的地方<sup>⑦</sup>。

以往的研究，使我们对西周初期燕国的疆域乃至该地区一些部族有了轮廓的认识，但是，如郭沫若先生推断的那样，燕国终究不是周初封建国的产物。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横的研究的同时，又要注意在纵的方面进行探索。燕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及部族徽号“亚天”（见本文第三节引）由商到周的自然延伸，为我们这种探索提供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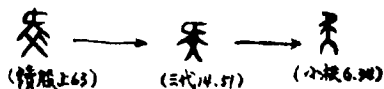
我们赞同《邃斋》将亚夭之“夭”释作“燕”，即把“亚夭”看作早期燕国的徽号。在燕地出土的周代青铜器中，亚夭器每与匱（燕）侯器伴出，亚夭徽号与匱侯铭文又曾见于同一器物，也给这个解释以有力的支持。

在前代多种青铜器铭文著录中，载有亚夭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部族或分族徽号的铭文，是一批为数甚巨的资料。有关亚夭徽号的族属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论者多把亚夭徽号看作古箕国所独有的标识。而古箕国当典籍何国何族，各家推断亦大有出入。如下面第三节所引据的诸种徽号所示，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与亚夭徽号相关联的绝非仅仅古箕族一个部族，与古箕族同时存在，同样使用亚夭徽号的部族或分族，除箕而外，还有共、害、非（北）、辛、福、守、孤竹、止（支）等，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恰恰却被忽略了。从而失去了全面观察与分析问题的依据。诚然，“箕侯亚夭”（见第三节所引徽号9）所代表的应是地处燕地，由商到周自然延伸下来的一个古老部族，但亚夭以及相关的诸分族，却不是“箕侯亚夭”这一徽号所能代表得了的。总之，亚夭徽号并非古箕国一个部族（或分族）所独有，而是所有使用这个徽号的诸分族所共有的标识。亚夭是这些分族徽号的主体，而箕、共、守、害等则是由这个主体繁衍派生的分支。

## 二、关于兵字的释读

前代多种金文资料著录中，对亚夭之夭，有各种不同的释读。《西清古鉴》释虔，孙貽让释彘，刘心源释昊，吴大澂、刘体智释作燕。王献唐先生在《黄县箕器》中释同昊、刘。近时邹衡先生也采昊、刘释燕之说<sup>⑩</sup>。

从金文字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夭字的演化过程应作如下序列：



《说文解字》燕部：“燕，玄鸟也。籀口，布翅、枝尾、象形”。夭字则正为侧首伫立燕鸟的象形。籀口，段注曰：“以廿像之”。《说文》竹部：“籀，籍也”。都是说燕子的喙部像籍，而夭字的上部正是这种形体的写照。枝尾，段注曰：“与鱼尾同，故以火像之。”金文鱼字写作𩺰（《录遗》36），简作𩺰（𩺰字所从，《录遗》289）与夭字下部或近似，或相同。所以，今天的鱼字、燕字下部所从都是火字。这也说明夭字下部所像就是燕鸟的枝尾。夭字的中段与燕子两分的布翅更是维妙维肖。又《说文》乞部：“乞，燕燕，乞鸟也。”段注曰：“燕篆像其籀口、布翅、枝尾全体之形，乞篆像于飞之形”。可以认为，商周金文、甲骨文中的夭字，就是燕鸟全体的象形，即夭字是燕字的古文，或说是燕字的古体。

《诗·邶风》“燕燕于飞”，传曰：“燕燕，𩺰也。”《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曰：“玄鸟，𩺰也。”《尔雅·释鸟》：“𩺰周，燕燕，𩺰。”舍人注：“𩺰名燕燕，又名𩺰。”燕、𩺰古均影母字，𩺰古匣母字，上古影、匣二母为双声<sup>⑪</sup>。

所以，燕、𪔐、𪔑皆为双声字。按上古韵部分析，燕属阳声真部，𪔐属入声质部，𪔑属阴声脂部，三字皆可互转。因而，一物三名，声韵都相和协，读音都相近似。

又鵙鸟，庄子谓之鵙鹇，鵙古音亦属影母，阴声支部，𪔐、意乃是一声之转。

刘心源释天为昊是有道理的。因为周代金文疑字天从。如疑罍，齐史疑罍之疑字均从天作。金文疑字既从天，则其音、义必与天相关联。《仪礼·乡饮酒》郑注“疑读如仡”，仡与𪔐同协质韵，声纽虽有喉、牙之分，但发音部位相近，故二字读音必相近，与鵙、与燕也近似。《诗·大雅》传云：“疑，定也”。《仪礼·乡射礼》郑注：“疑，止也”。定、止的意思又与燕字训安在意义上相近。所以，我们认为金文疑字在形、音、义三方面均由天字所衍，从而也可反证天应释作燕。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天作为燕的部族徽号，是自商至周自然延伸的。但是从西周的最初年代起，金文中不用作族徽的燕字一律写作𪔐，战国时代作𪔑，并且𪔐字与徽号天字同见于一件器物的铭文中（三代14、10）。大约自秦以后，古籍中又一律改作燕。可知，𪔐、𪔑的使用是与周代的燕国相始终的。我们推测，当周灭商之后，虽然用作徽帜的天字未因政治变革发生变化，但在用作部族称谓的时候都改用同音𪔐字，其原因大概是出自周初统治者的专擅手段，即可能是所谓“启以商政，继以周索”政策的一个方面。至秦以后，之所以又恢复了燕的本字，应是由于秦、燕、商出于同一族系，有着共同的祖先与图腾崇拜的缘故。《秦本纪》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索隐曰：“女修，颛顼之裔女，吞𪔐子而生大业。”《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可见燕与秦与商属于同一族类的不同分支，当秦统一后，恢复燕在商代的故称是可以理解的。

### 三、金文徽号所反映的燕国部族及其分支

我们从商、周金文资料中，选择亚天及其分支的部族徽号数例，排列于成图一下，然后再予以说明。

图一的1—16例都是亚天族类的部族或分族。

1—7是燕的国族徽号。8—16是燕国各分族的徽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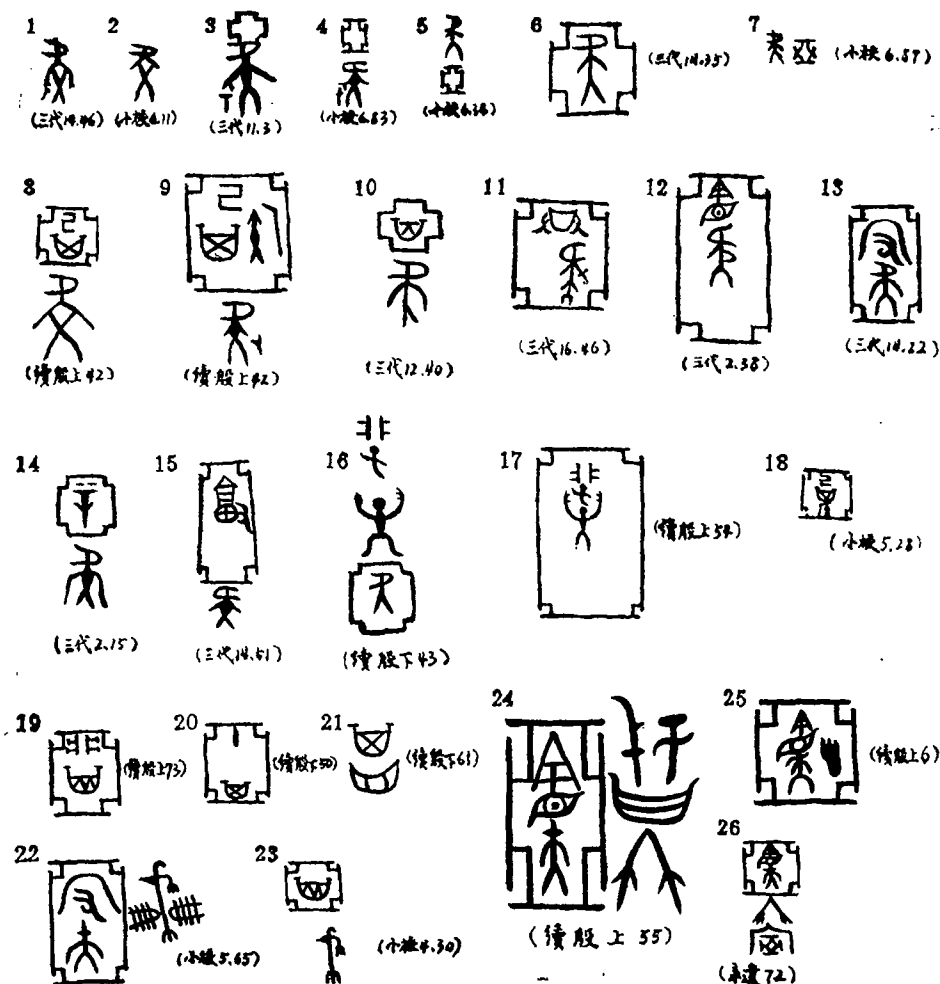
以上凡用作各分族的徽号的，都是由亚天与各分族的名称复合而成的。亚天是各分族徽号共同具备的成分，它们的不同，是在这个共同成份之上标以各种字样，如𪔐、共、害、守、辛等。以前大都以为亚天是古𪔐族所独具，其实，古𪔐族仅仅是亚天族类的一个分族而已。如各族徽本身清楚表明的那样，𪔐与共、害等之间只能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从属的关系。诸分族的徽号均以亚天为主体，其各自本身则不过是这个主体的分支。

另外，在亚天族类的徽号中，还有一部分较为特殊者，亦需加以说明。

由上面摘引的这些例子，可知：

- (一) 一些分族的徽号往往不署部族徽帜“天”单独出现，如图一的17、18。
- (二) 两个分族的名称共同署于同一亚形字框（或不具亚形）当中，表示着分族之

间的某种组合，如图一的19—21。



图一 亚戾及其分支的部族徽号

(三) 在一些分族族徽的旁边又增加一个或两个另外的族称，似应看作这些分族的分支。如图一的22—26。

(四) 上引分族徽号22、24—26守、害下有夫字，过去释作夫，我以为它应是戾字的变体，这从22与13，24—26与12的对照中可知，此作夫者，则彼作戾，夫为戾的伪变无疑。

亚戾这个徽号，有着各种不同的变体。

(一) 戾字在书体上或作戾，或作戾，或作戾。表示燕子的头、身两部分有分书、



合书两种，头部方向有向左、向右两种，布翅下有无物、有物两种，鸟身部分有中空、填实、单线三种。

(二) 亚字的写法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两笔相交处作直角，延长四边所得的是正方形；另一类两笔相交处不作直角，延长四边所得的大都是长方形。

(三) 亚与𠄎在书写与相对位置上有分书、合书两种：合书者𠄎一律在亚下；分书者𠄎或在亚上，或在亚下，或在亚侧，或在亚内。

然而，不管亚与𠄎在写法上，在相对位置上作何种变化，这个徽号却始终以亚与𠄎两部分组成，𠄎字也一直保持着燕子的象形特征。

因而，上述变化并不表示所属部族上的差别，它是由作器的时代不同，铭文的书者不同，在器物上的铭刻部位不同造成的。即使是同一分族的器物，徽号的字体也不完全一致。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变化中的有用成分就在于它的时代性。只要我们把亚𠄎徽号字体的演化跟一些确有年代可考的器物结合起来，它就可以用作判定器物年代的参照标准。

亚𠄎诸器中由铭文内容可以判知器物制作年代的仅有小臣邑𠄎和北京芦沟桥出土的亚盃。

小臣邑𠄎（小校 6、87）铭文曰：

癸巳，王易（锡）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罍彝。隹王六祀夕日，在四月。亚𠄎。

称年为祀，先记日、后记年月是殷人的习惯，夕日是五期卜辞即帝乙、帝辛时常见的一种祭名，所以该器属殷末乙、辛时代。

亚盃（小校 5、32）铭文曰：

箕侯亚𠄎匱侯易（锡）亚贝，作父乙宝罍彝。

燕写作𠄎是周初开始的。李学勤先生定此器为康王时代，可从<sup>⑩</sup>。

通过上述两器的亚𠄎徽号可知，在商末周初，这个徽号的一般特征是：

(一) 亚形两笔相交处一般不作直角，作直角者亦不规整（即不作 L，而作上），延长四边所得的矩形一般为长方形。

(二) 𠄎字大都以粗细均匀的线条写作𠄎，少数为身部填实者，身部中空者罕见。

(三) 亚与𠄎皆不合书，𠄎与亚的相对位置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有的更置于亚形之中。

(四) 凡燕之分族的称谓一律写于亚𠄎徽号的亚字当中（仅箕分族徽号有个别不书𠄎字者）。

与这类徽号同出的铭文，其铭辞款式已渐臻完备，即所记事件的时间，作器的原因，作器者的名字，祭奠的对象，器物的统称“彝”，形容词“宝罍”等大都具备了。当然，仅记被祭人日名以及日名之上加以“作”字的简古形式这时仍然保留着。

区别于上述特点的另一部分亚𠄎徽号，书写特点有如下几项：

(一) 亚形两笔相交处均作直角，延长四边所得的矩形为正方形。

(二) 𠄎字只有中空的𠄎、填实的𠄎两体，无单线的𠄎。以鸟身中空者较早，填实者较晚。

(三) 亚与𠄎皆为合书，𠄎字均在亚下。

(四) 亚𠄎徽号的亚形字框中，尚未出现各分族的名称。

这类徽号一般都单独铭于器物，至多不过加书被祭人的日名而已（按商人以日即以天干为名）。

这部分器物的制作年代，大致为乙、辛以前的商代后期，最早者，可能与祖庚、祖甲时的贞人𠄎同时。

#### 四、亚𠄎是燕的国族徽号

虽然亚𠄎器早年间曾出土于北京芦沟桥，近年又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与辽宁喀左北洞出土，为确定该族徽的族属在地域上给予了有力启示，但这还不够，除开上面从𠄎字的音义上予以疏通外，还要从徽号本身以及相关铭文中，联系有关文献，反复印证，对该徽号的族属提出有力的证据来。

(一) 《世本》（清张澍集补注）燕谱：“燕，幽州郡北燕（《太平御览》）。宋忠云有南燕，故名北燕。”

澍按：“北燕伯𠄎……。”

《诗地理考》卷四，燕引《括地志》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句下有“北燕伯𠄎始见春秋”八字，当是张氏之所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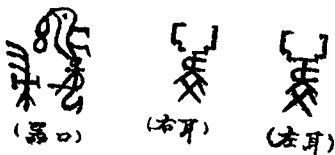
《史记·燕召公世家》燕侯系谱，皆称以公、侯、王，“伯某”之称不见。且“北燕伯𠄎”之语不是指某一个公侯而言的，言“伯𠄎”即可指代燕，故《诗地理考》将“北燕伯𠄎”一语系于“故国取名焉”句下，其意应指“𠄎”字来源于国族的名称。在原始社会末，奴隶社会初，以部族名称称呼其首领的习惯是十分流行的。我国商周时代也是如此，族名、人名、地名往往三位一体的。伯𠄎之称，犹矩之称伯矩，𡗗之称白𡗗，都是以族称作首领称谓的例子。“伯𠄎”之𠄎，《说文》无，世以为𠄎之俗字，《说文》𠄎字从𠄎而不从𠄎。我认为𠄎可能是疑（即𠄎）字之讹。《春秋》昭公三年“北燕伯𠄎奔齐”，史家不能确指为燕系谱的哪一代，因系出奔弃国之君，故不以谥称，而称之为名号。“伯𠄎”之称为亚𠄎是燕之徽号提供了一个佳证。

(二) 说明亚𠄎是燕的部族徽号的例证也可在徽号与铭文的联系上找到。《三代吉文存》卷十二第二页所载鸛妇壶铭文，给我们以有力支持。

鸛妇壶是亚𠄎族为鸛妇所做的媵器。

在商代，铭有“某妇”的铜器很多，我们认为，与妇字连署的另一字均为妇人所出之族名。铭于鸛妇壶口沿的是图形化的鸛字，即玄与鸟二字的合文。玄鸟就是燕子，此妇以鸛字称呼，表明她所出的部族

名为玄鸟，即燕子。在同一器物的两耳部，又各铭刻着两个完全相同的部族徽号。这个徽号就是亚𠄎，说明鸛即𠄎。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为本族女制做的送嫁器物上标明其出身的族徽号，是合于情理的。这进一步证明，亚𠄎应是燕的国族徽号。



(三) 如上节所述，在商代晚期的许多亚矢徽号上，往往又赘增了鬯、害、共、非等字，这是在亚矢这个国族之下，又“以字为谥(氏)”分衍派生的各分族的名称。这些分族的事迹，有的在典籍中茫然不可考究，但凡可以大略考见其史迹的，都与燕有关。

例如：

(一) 清道光年间，山东济宁寿张梁山山下曾出土古器七种，是大保召公奭辅佐成王东征淮夷时燕国贵族的遗器，内有伯害盃、害鼎各一件。伯害盃铭文是：

白害乍召白父辛宝鬲彝。

害鼎的铭文是：

佳九月既生霸，辛酉，才匱，侯易(锡)害贝、金。扬侯休，用乍召白父辛宝鬲彝。害万年子孙永宝，光用大保。

盃、鼎铭文中的伯害、害应是一个人。陈梦家先生认为害与第一代燕侯——旨为兄弟，是召公奭的子辈。显然害是燕国的显贵。作为族称，害字又经常出现于亚矢徽号之中(如上节所引12、24——26)。在氏族制度下，以氏族名称呼该氏族的成员特别是该氏族的首领，是氏族的基本原则之一。害既作族名又作人的称呼，当是这样制度的遗痕。从作为人名之害与召公的关系以及作为族称之害与亚矢徽号的关系，又可以证明害乃燕的一个支族，亚矢应是燕的国族徽号。

(二) 正因为害字又用作族称，从而说它作为一个氏族(或部族)在商末即已存在才可以理解。在商末的害分族的徽号“害亚矢”上面，又往往增书“孤竹”二字。孤竹是商代北方的一个封国，一般认为在河北卢龙附近。《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十八永平府“孤竹山在卢龙县西……孤竹国城在其阴。”孤竹在铭文中与亚矢徽号同出，在地域上恰属燕地，这一事实又为伯害分族与燕的从属关系提供了一个旁证。虽然伯害的史迹尚不可考，却也有力地支持了亚矢为燕的国族徽号的论点。

(三) 据《考古》1974年5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一文所载，房山县琉璃河西周墓地M52出土了一鼎一尊，其铭文也给我们以有力的启示。鼎铭曰：

侯赏复贝三朋，复用乍父乙宝鬲彝。斿。

尊铭曰：

匱(燕)侯赏复冂衣、臣妾、贝，用乍父乙宝鬲彝。斿。

两器铭末所署的族徽，也是商至周初的一个著族。这个徽号也与亚矢连署(如上引徽号16)。它的简写“非”又常常与匱(即鬯)同书于同一亚形当中。斿族与亚矢在徽号上的密切联系，斿族成员与燕侯之间的从属关系，器物的出土地点，都证明斿(或其一支)是燕国的一个支族。这又为我们推断亚矢即燕之国族徽号增加了一个证据。

(四) 近年北京房山县琉璃河M251出土了一件铜鼎，铭文为“其亚矢”。一百多年以前，芦沟桥曾出土“鬯侯亚矢”铜盃，近年辽宁喀左北洞又出土“鬯侯亚矢”方鼎。这些铭文都在亚矢徽号中记下了其(或鬯)分族的名字。

从徽号，从出土地表明，鬯与燕的关系已是不言而喻的，它的地望只能求之于燕地。所以，我们赞同“燕地曾是商代鬯族(或其一支)的所在”的说法。由古鬯器数量，种

类之多，可知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箕是一个势力雄厚的部族。我们认为，它只能以典籍之蓊当之。

《说文》箕部：“从竹、𦰇象形，丌其下也。𦰇，古文箕。”又《说文》邑部箕：“从已，其声，读若杞。”朱骏声认为箕“从其，已声。”是正确的。《说文》邑部蓊：“周封黄帝之后于蓊也。从邑，契声，读若蓊。”段注曰：“郑、蓊古今字也，蓊行而郑废矣。”但是，郑并不见于金文，蓊郑为古今字之说不可信。蓊与箕古音同属牙音见母，二字双声，上古皆属支部字。蓊之为箕，乃为同音假借。考古资料证明，古蓊城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因而，箕族称谓出现于燕之国族徽号中也非偶然，蓊乃燕国属下的一个分族。亚矢被看作燕之国族徽号，又得到了一个佐证。

(五)《史记·五帝本纪》舜“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孟子·万章》“舜流共工于幽州”，《尚书·尧典》尧“流共工于幽都。”幽陵、幽州、幽都均指今北京一带。《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分燕置幽州。”所以共工氏被流放之地当在北京附近。《括地志》：“故箕(与共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都，居此城。”《读史方舆记要》引《括地志》曰：共城“在檀州燕乐县界，即舜流共工之地，一作箕城。”由以上记载，可知共工被流放的地方在今密云县一带，商周时代这里应属燕地。亚矢徽号中有一分族的名字写作共，即共字。我们认为该分族应该就是共工氏的后裔，在商时加入了燕的部族联合，故将其族称书于亚矢徽号之中。这又为我们将亚矢看作燕的国族徽号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证据。

总之，通过亚矢部族与诸分族事迹相互参证，各分族不仅在徽号上与亚矢相联系，在地域上与燕地相关联，而且在铭文内容上亦往往与燕侯有关，足以证明亚矢为燕之国族徽号，其上标以不同名称者则为其分族的徽号。

在氏族制的高级阶段上，随着氏族组织的不断扩大，氏族，不仅由其分割作用繁衍派生出许多子氏族，即许多分支，而且又由他们之间的天然血缘纽带，复又组合成为递进的高一级组织——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因而，近亲部落联盟的各部往往共同起源于一个古老氏族，于是，这个古老氏族的名称就成为联合整体的名称。亚矢及诸分支的金文徽号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亚矢之所以成为各分支徽号的主体，正表明各分支由亚矢分衍而来；各分支虽大都成为独立的部族，如箕已是侯爵国家，邶已是伯爵国家，但它们仍在自己的新称之上冠以亚矢旧称，以表示自己的源起，亦表明他们属于亚矢联盟的成员。商周时代，社会上一些著族都踏入了文明的门限，逐渐发展为奴隶制的城邦组织，国家的雏形已孕育在各部族之中了。但它们毕竟还是十分弱小的、羽翼未丰的诸侯小国，进攻与防卫的需要使他们不断结成亲族联盟，旧日的部落联盟的原则仍旧保留下来。部落联盟成为奴隶制国家发展与统一过程的历史媒介，亚矢及其分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

## 五、燕的都邑、封地、世系与燕的部族

在史籍中，有关燕国都邑、封地的记载似乎十分杂乱，历来争论很多。人们总以为燕的封地只会有一，不会有二有三；同样，燕的都邑也只会有一，不会有二都甚至三都

同时并存。实际上燕国的情况并不如此，不但它的封地有三处，都邑有三个，而且燕侯世系亦可以分作三段，分属三个不同系统。资料证明，造成这些复杂现象的症结所在就是燕的部族联合，这就是聚讼纷纭的都邑与封地问题的结论。

典籍所载，春秋、战国时代，燕有三都，中都、下都之称见于文献，上都之称虽文献不载，但中、下二都既为事实，上都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sup>⑧</sup>。

#### 下都：

《易水注》：“易水又东迳武阳城南，……故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

《元和郡县志》卷十八易州易县条：“武阳故城，县东南七里，故燕之下都。”

燕下都遗址在今河北易县城东南。

#### 中都：

《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良乡县条：“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

《顺天府志》卷十三良乡县条下引《图经志书》：“春秋、战国时在燕为中都，西汉置良乡县。”

汉良乡县遗址在北京房山县窦店镇西。

#### 上都：

《韩非子·有度》：“燕襄王以河为界，以蓟为国。”

《燕召公世家》：“（燕王喜）廿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

《战国策·燕策》秦王：“诏王翳军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

襄王以蓟为国（都城）以及秦拔蓟为燕亡的标志，均表明蓟为燕的主要都邑。

关于燕国三部的起迄年代问题，典籍所载皆简而不明。据《韩非子·有度篇》所载，起码在燕襄王（《史记·燕召公世家》作“襄公”）时，蓟已经成为燕国的都城。襄王（公元前657—617）在位时，当春秋中叶。就是说，从春秋中叶开始一直到秦拔蓟城燕国灭亡止，蓟一直是燕的都城之一。又如上引《太平寰宇记》所言汉良乡县“在燕为中都”，《顺天府志》又进一步明确“春秋、战国时在燕为中都。”这样，中都、上都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关于下都的起始年代，《世本》谓“桓侯徙临易”，《燕世家》集释以此桓侯为宣侯子、庄公父在位七年的桓侯。宋忠曰：“临易，今河间易县是也。”陈梦家先生认为“战国易邑，汉代的易县，今雄县。”又说：“雄县临易，易县亦临易，故所谓‘临易’，亦可以指今易县。……我们暂可定当纪元前四世纪之后半期，燕都于易水之上的易县，此为下都。”如此，则战国中期以后，在中都、上都并存的情况下，又增置了一个下都。一国兼有三都，这种情况在列国中是少有的。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看，起码在战国中期以后，燕国是三都并存的。因而，这种情况是不能用迁都的说法予以解释的。我们认为三都并存是由燕国的部族联合造成的。这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证明：

#### （一）燕国有三处封地

与燕国有三个都城相应，燕国的封地亦恰有三地，这决不是偶然巧合。

1、《燕召公世家》索隐：“后武王封之（召公奭）北燕，在今（唐）幽州蓟县故

城是也。”此说以为燕的初封地在今天北京。

2. 徐才《宗国都城记》“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括地志》引此说，并以“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即认为燕召公的初封地在今天的蓟县一带。近年，常征同志指出此燕山之称后起，并据《山海经》以今房山县、门头沟区之大坊山、百花山等为古之燕山<sup>④</sup>，是正确的。《都城记》所谓“燕山之野”应指今房山境大坊山东南方的原野。

3. 《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七易州：“废涿水县在州北四十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此说虽与前二说在册封时间上有差，但指出今涿水县也是召公的始封地之一。

关于燕、蓟的关系，是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索隐》认为，从燕召公始封时起，燕、蓟就是一国。然而，对于《周本纪》“褒封……帝尧（乐记为黄帝）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的册封记录，未能给以解答。《周本纪》正义为了圆通这个问题，认为“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此说以燕、蓟原为二国，后合二而一。两者归一的原因乃是燕对蓟的并吞。但是不管怎样，两者都以唐幽州蓟县（今北京）为燕国的中心所在。故正义提出燕蓟之封“稍似重也”的疑问。顾炎武也提出“一地不容封二国”的想法。最近又有人提出“一城何以封二国”的问题。对于燕蓟之间若分若合，若即若离的爱昧关系，如不搞清楚两者间部族与分族的从属关系，这种疑虑是无法解除的。其实，燕蓟不曾封于一城一地，只是由于蓟为燕的分支，从而蓟就是燕部族联合的当然成员。它们分开是独立的部族，合起来又成为一个联合整体，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总之，典籍所载，周初燕召公的封地为：

1. （唐）幽州蓟县（今北京），此乃上都之所在；
2. 燕山之野。（今房山县地大坊山东南之原野）燕之中都城就在这块原野上；
3. （宋）废涿水县地（今涿水），涿水县以南四十里即燕之下都。

燕之三处封地应为三个部族（或分族、下详），燕之三个都城应为三个部族的都邑所在。

## （二）燕侯世系的三个阶段

《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载燕侯系谱的一个怪现象，就是历代燕侯谥号反复重迭过于严重，这在列国中也是罕见的。列国中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但均有较为切实的理由可以解释。比如：齐国世系中先有襄公、桓公、宣公，后有桓公、宣王、襄王，即齐国系谱中的桓、襄、宣三谥各二。这种重复是由姜齐与田齐的更迭造成的。前面三谥属于姜姓齐侯，后面三谥属于田氏代齐以后的田姓齐侯。姜齐、田齐虽同是齐国，但两者王、侯的系谱却属两个系统。在秦国王、侯系谱中，其谥号虽多重重复，但总是给重复谥号的后者，冠以另一个字，以便加以区别。如共公与厉共公，襄公与昭襄王，文公与惠文王、孝文王，虽有重复，亦有区别，并不紊乱。但是，燕国的世系较之齐、秦要复杂得多。自西周共和时的燕惠侯开始，至末世燕王喜，计三十五世，谥惠、桓者各三，谥釐、宣、昭、文、孝、成者各二，谥号重复者总计为18世、占二分之一强。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燕世家诸公、侯、王属于一个系统，则其谥号绝不可能紊乱到这样的程度，

当时的史官也绝不致粗枝大叶到这样的地步。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一种似乎紊乱不堪的状况呢？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只要我们依据燕国上、中、下三都的起迄时间将燕侯世系分作三段，则这种重复现象均在三段之间，而每段之内便不复存在。

三段的划分：第一、二段以襄公都薊为界，第二、三段以桓公徙临易为界。燕世家有三桓侯（或公），《世本》以徙临易的是指在位七年之桓侯（宣侯子、庄公父），《水经注》又有文公（易王父）徙易之说。陈梦家先生认为：“徙临易的桓侯应是在位十一年的桓公，而徙易的文公应是易王以前的文公。”与《述异记》“易者燕桓侯之别都，至文王（公）迁易”的说法相合。

下面将燕侯世系中谥号重复者分三段排列对照如下：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惠侯—庄公）	（襄公—釐公）	（桓公—燕王喜）
惠侯	惠公	惠王
桓侯	桓公	桓公
釐侯	釐公	
宣侯	宣公	
	昭公	昭王
	文公	文公
	孝公	孝王
	成公	武成王

从上表对照中可以看出：凡是相同谥号为三个的，则此三谥遍及于三段之中，每段各有一个；凡相同谥号为二个的，则分别分布在两段之中，或一、二段各一，或二、三段各一。这种有规则地重复现象证明，《燕召公世家》索隐把燕侯世系中严重的重复现象解释为“盖国史微失本谥，故重耳”，不过是一种臆测而已。

既然燕侯世家谥号的紊乱现象，在分段观察时竟一下子变得有条不紊，而每段的划分又完全与燕之三都的起迄时间相吻合，三都的设置进而又与三种封地记载相契合（详下节），那么，一个合于逻辑的推想就是，燕侯世系本来就属于三个系统，三个都城就是这三个系统各自的都邑，三块封地是三个系统各自的领地。这样的系统应该就是分族，燕就是由这些分族联合而成的整体。燕世家的三段反映了在不同时期中，它们曾先后是燕这个部族联合整体的首领，它们的都邑当然也就被看作是燕的都城。

### （三）燕国三都及封地的考古资料

基于上节的分析，燕侯世系三个阶段的形成，乃是由燕国部族联合的首领在各分族之间的转移造成的。即世系的三个系统分属三个不同分族（或部族），而三个不同的分族则有着各自不同的封地与都邑。就燕国上、中、下三个都城的转移而言，它不是由于先前都邑陷于敌手或城垣毁灭（原因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而迫不得已的行动，它只不过是随着部族联合的首领的转移而形成的自然转移（因此以不说迁都为宜）。三个都邑不因此等转移而存在，亦不因此等转移而消亡，它们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所以，如文献所载，或两都同在，或三都并存，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清末直隶涿水张家洼曾出土了一批“北伯”青铜彝器，王国维在为这批北伯器作跋

时说：“余谓北（即邶）即燕……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王氏的这个推测是本自《太平寰宇记》“废滦水县……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的记载。故此，今滦水在古代应为北伯的领地，在周初为召公的封地之一。可以认为，《燕世家》索隐所谓“后武王封之（召公奭）北燕，《世本》所谓“居北燕”之北，不是宋忠所谓南北之北，它应当就是“邶、庸、卫”之邶。

《太平寰宇记》还说：燕召公始封即今滦水县，后徙都于蓟，以武阳为下都。这些话虽与实际有出入（武阳为下都在蓟为上都之后），但却反映出这样一层意思，即下都武阳应包括在滦水这块封地之内。这块封地上的北伯部族的都邑最早应在“废滦水县地”，此地距下都武阳，如《太平寰宇记》“在（易）州北四十里”的记载，两者可能有承接关系。古代选定都邑位置时，在这样距离上进行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所谓“桓侯徙临易”，“文公徙易”，其出发点应是滦水而不是上都蓟。如果说徙自上都，则易为下都时上都并不曾废弃，所以不能言徙。另外，徙临易的桓侯属于燕世系的第三段，与都蓟的燕侯（即第二段）不属于一个系统，自不会从别个部族迁都到本部族来。而一个都城的迁徙不是一代所能完成的，所以说“桓侯徙临易”（临易即易，从陈梦家说）《述异记》谓“易者燕桓燕之别都”，说明桓侯时欲徙然并不曾徙，所以又有“至文王（公）徙易”之说，到桓侯孙、文公子才完成这次迁徙，故史称易王。前面所说燕侯世系的第三段所代表的就是以易为都邑的一个部族，这个都邑的前身应当求之于燕召公的封地之一的滦水境，即北伯领地之内。

在本文前面几节的讨论中，已知在燕的部族徽号之下，有一分族为𠄎（见上引部族徽号16）它在与“箕”分族同时出现时简写作“非”（见部族徽号19），非字在另一些器物铭文中又作如下的变体，如“丄”、（《小校》5、87）、“北”（《三代》2、13）、“𠄎”（《小校》7、20），可知非乃是北字在用作族徽时为了美观起见的一种图案化变体。如此，带有这个徽号的铜器应为北伯器物，时代多属商代。它与燕一样，都是由商自然延伸下来，在徽号上表现为亚兵的一个支派，即燕部族联合中的一个分族（或部族）。此种徽号的铜器在琉璃河已有出土，铭文内容又与燕侯直接相关，均给我们的推论以有力的支持。

近年房山县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发掘，不但发现了西周时代燕侯家族的墓地，掘得多件燕侯及与燕侯有关的铜器，而且还发现了商周时代的古城一座<sup>⑥</sup>。一些历史考古学者认为这里就是燕召公的初封地。琉璃河商周古城地处古圣水河畔，西望燕山，东临平原，其地正是名符其实的“燕山之野”。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证明，《宗国都城记》的记载也是可靠的。《太平寰宇记》说位于房山县窦店镇西侧的古城是汉代的良乡县，燕国的中都城，这个中都城距琉璃河古城仅仅五、六华里。可见，中都城也曾有过近距离的移动。襄王都蓟之前，西周燕国的最早都城应该就在这里。从文化遗存看，琉璃河墓葬从西周早期延续到西周晚期，窦店古城内的文化堆积年代最早者可到东周之初，两处遗址是可以衔接起来的。燕侯世系的第一段所代表的就是以早期中都（琉璃河古城）为都邑的一个部族，召公奭封地之一的地处燕山之野的燕（亦即北（邶）燕之燕）就是该部族的领地。前面讨论的亚兵徽号当是来源于居住在这里的燕部族。徽号证明，燕曾是商北方重要的盟国，琉璃河发现的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sup>⑦</sup>以及商代卜骨都是燕国历史渊源的见证。



1957年，今广安门附近曾发现战国及战国以前的古文化遗址。在一处辽金宫城夯土台基的下面，有堆积甚厚的古文化层，内中包含的古陶器年代最早者接近西周（文化层未见底，当有时代更前者），其中的战国饕鬄纹半瓦当，久被公认为燕宫常用的屋瓦构件。解放以来，在北京外城西北转角，东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广安门内外，法源寺东北，陶然亭公园，发现了大批战国、西汉的陶井以及唐至辽金时代的砖井，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水井密集地出现在同一范围内，说明古代北京地区的人们在这处遗址进行活动，自东周（或更早）至辽金始终没有中断过。《水经注》所谓“蓟丘”就在这处遗址的西北一隅。历史考古学界认为，这里就是古蓟城的所在。《正义》所谓“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索隐》所谓“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蓟城遗址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这里起码在战国时代确曾是燕国的都城之一，以蓟城为中心的古蓟国也应当是燕召公的封地之一。这处遗址是否有更早的文化遗存，是否如中都、下都一样曾有过移动，由于考古工作尚未开展，这些情况均有待解决。不过，据燕侯世系第二段，即襄王都蓟之后、桓侯徙临易之前的一系燕侯，为蓟分族系统是可以肯定的，说明古蓟城的历史应比战国更早。前面讨论的“𠄎侯亚𠄎”族徽则说明自商至周，蓟就是北京附近的一个侯爵国家。距这里不远的丰台区榆树庄曾出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鬲<sup>⑩</sup>，它是这个地区先燕文化的直接证据。

上面所讨论的与燕的三个都邑、三处封地有关的三个部族，正是亚𠄎以及属下的𠄎（即蓟）非（即邶）这样三个强大的部族。它们是燕部族联合的主干，是联合首领的承担者。它们的领地各是燕封地的一部分，各自的都邑又是燕的都城之一。当然，如徽号所示，燕部族联合不仅仅由这三个部族组成，但这三者毕竟是这个联合的主体。

## 六、燕、蓟早期史迹概述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金文、甲骨文中的𠄎、𠄎（指与亚𠄎徽号相联系的一支）这两个古老部族，就是位于祖国北方的燕与蓟。从而，我们就能从这个基点出发，在前代多种金文著录中找出大量古燕、蓟的遗物来。铭文内容是极其简单的，绝大多数仅记族徽而已。唯其如此，我们也可以追踪到它们的发展与繁衍的种种史迹。

在商代后期的祖庚、祖甲时代，卜辞中有一位重要的贞人，名字就叫作𠄎。该名称与金文徽号之𠄎在写法上完全一样，只是二者的用途有所区别罢了。金文亚𠄎是燕的徽帜，卜辞之𠄎是来自燕部族，并以族为名的贞人的称呼。当时，贞人以其所出之国族名作为自己的称呼是一个普遍现象，不独𠄎一人如此。商代的贞人集团，是界于神、人之间的王权神意的代言人，地位是相当高的。而𠄎又经常与商王一起进行贞卜活动，或作命辞、或作占辞，或者以人的身份进行贞问，或者以神的意志做出回答，足以表明贞人地位的显要。以合书亚𠄎作徽号的燕器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铭有合书亚𠄎的器物，不论器类与数量都是很多的。我们认为这些器物应为亚𠄎部族所作，而不能归之于贞人𠄎一人。这说明，起码在庚、甲时期，燕就开始强大起来，并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历史剧目了。贞人𠄎则堪称燕部族的名声显赫的代表。𠄎以部族的代表参与到商王为首的贞人集团，则表明燕部族应是商代诸侯联盟中的重要一员。